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

陈漱渝 主编
傅光明 编

中

解读萧乾

J I E D U X I A O Q I A N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主编 陈漱渝

解读萧乾

傅光明 编

中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政党·和平·填土工作

——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

自从上月8日，本报那篇论《自由主义者的信念》的社评刊出后，全国由平津以至京沪港粤都发生了迥乎不同的种种反映。其中有的是代表了集团立场，有的发挥的则是个人意见，足证这个问题是盘旋在左右朝野的怀念中。首先，这证明国人在燃眉问题之外，还关怀到抽象而基本的思想途径。其次，在我们看，真理不应是主观的。真理之经过驳辩，有如矿苗之经过火炼。我们欣喜今天有机会来再度剖释我们立场。

中国是向来讲求“正名”的国家，然而很奇怪，先分析而后下结论的逻辑学却始终未见昌兴。这不幸的事实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科学的落伍。以今天为一阶段的民国文化史，其上半部几乎全是科学化运动，然而到今天我们论争起来还不免各是其是。这也许因为我们一面虽急于正名，

然而我们更急于护道。单就驳责我们的文章看，来路大约不出三个方向，论调可概括为五。所谓三个方向，即是代表集团的左与右，及代表个人的“中间”。在左右阵营里，又各有“迎”与“拒”两种论调。右方面“迎”我们的，说你们主张“三民齐重”，岂不刚好志同道合？“拒”我们的则很少正面驳斥。有的比我们作黄老墨家，有的责备该文未以戡乱做结论，因而还不免“民族失败主义”的嫌疑。左方面“迎”的方面说：“自由主义不应当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，因而即不应当反对苏联，尤其不可反对共产党”。“拒”的方面论点也不一。其中责备我们最严苛的是“此非时也”。因而怪自由主义者“早不喊，迟不喊，却在此时喊了自由平等”。比较令我们佩服的，倒是关心国事而不代表固定集团的许多朋友们，他们的质疑引导我们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切的思索。

恰如我们所担心的，许多人依然把“自由主义”与“自由党”混论为一，因而问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阶层为何，代表人民的百分比，同时要自由主义者为时局对症下药。有的甚至说“既为主义，就应当有纲领，方能产生赖以联系信徒的共同组织”。真像是说，现在国共以外既有民青二党，你们何不也凑成一股。然而没有比这个距我们理想更远，或比我们原有抱负更渺小的了。这个误会其实是出于“主义”这个时髦名词上。半世纪来我们不

断听到这个使野心家雀跃使民众寒心的响亮名词。它好似替代了帮会的堂号标帜，“同志”也罢，“信徒”也罢，它的后面永远离不开一簇共生共死的盟兄弟，以拼命精神去打天下。一般人因此竟忘记“主义”的最初意义原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，一种基本的信念，政治不过是整个人生的一环。因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产生政党，正如瓦特的蒸气学之产生火车头。如果原理站得稳，它还可以应用到火车头以外别的机器上，甚至造成一番彻底的工业革命。我们认为自由主义倡到极峰时，有热心人士出来组党，是很自然的事。正如辛亥以前反满思想之终于产生了兴中同盟两会，但同时我们敢说，如果自由主义不变成一种基本信念，浸入我们的精髓，使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唱此论调，居家出外，待人接物，都是彻头彻尾循此精神，那么，恐怕所谓自由主义，充其量它也不过是幅样式稍微新鲜的帮会旗帜而已。

一个政党的确需要“信徒”，聚徒众而形成“组织”。铁的组织，钢的纪律，愈坚固紧严，其取得政权或维持政党的机会愈大。为求组织纪律的钢铁化，只有牺牲个人自由，一切由党魁或少数头脑指挥。换言之，一个主义一旦组织化了，势必就得寡头化。一个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者，为达到政治目的，也许受得住木棍的指挥；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，因为受不住严苛的纪律，就可能站在政

党之外，保持其独立的立场，保持其个人发言权。这要单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气质与立场了。需要集体行动的“政党”，本质上并不适合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口味。去年英国工党少壮议员的叛变，就是明例。一个国家里有反对派在议会拍案痛骂，甚而游行示威，这个国家一定是生气蓬勃的；一个政党内的少壮派因看不惯现状维持分子的苟安而叛变，也证明这政党的青春有力。这现象却为自由主义国家所独有。

仅就一月来本报及全国各地讨论自由主义的文章而论，即知大家对这个名词的诠释及了解原不一致。一部《资本论》，一部《新经济政策》，一部《史达林言论集》，便为共产主义下了天经地义般的界说，国民党也有三民主义及领袖的著作可据，然而自由主义却没有固定的书本。由卢梭、康德以至罗素、杜威；由杰佛逊、林肯以至倡四大自由的罗斯福，都各用墨水或行动写下了自由主义的界说。所有政党都有其短期的集中训练所，自由主义的训练所却必须由摇篮以至幼稚园开始。这训练不假借黑板粉笔或风雨操场，而是散播在大气中，沁人心脾。然而有此基础，无论他参加什么政治集团，本质上他有不同处：或于尖锐对立时能体解对方，如罗曼·罗兰于上届大战之拒绝盲目仇德；或于恐怖手段成为家常便饭时出面阻拦，如新近殉道的甘地。在很容易走极端的今天，我们敢说左右集

团中都可能这种人物。换言之，作为一种人生态度，自由主义非国也非共，而国共阵垒里也可能都有其存在，只是现实政权及严厉党纪抑制其发展而已。于是，在中国现况下，自由主义者无形中便成为无党无派的代名词了。这个偶合，其实是人为的。只要翻看一下政协时代国共双方对国是的一串串意见，即知我们的主张，本是在建设心情下所有善良人的主张。

自由主义与自由党应分别而谈，还另有原因在。如果有人以为我们认为国民党代表民权，共产党代表民主，那是大大的误会。我们指出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不可偏废，并非是说一边的中国已有了自由，而另一边已有了平等，除了少数豪富以外，整个中国谁个不受着贫困流亡的威胁？而且愈打自由的负数愈大，贫穷的程度愈深，中国距离 20 世纪也愈远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国怎配谈政党政治？今天的政党支持的不是选民票数，而是枪杆的枝数。如有人向崇尚理性，鄙夷武力的自由主义者要政纲，甚至要“行动”，那纵使出自善意，也等于拖人下水。当中国自由主义者也想弄枪杆时，中国民主的前途就更无望了。

至于“此非时也”，原不值我们一辩的。如果有人认为某项路线对中国人民是有百利无一害的，一个政党可以因其军事行情而伸缩变换，但观点单纯的我们却不能随着行情走。二十多年来，本报言论对国内始终不出民主、统

一、和平、进步四大原则，而在四者的紧密连环性，也是不厌一再絮聒的。然而三十多年来，想统一中国的各方有力者，似乎始终不曾重视民主与和平是统一的必由之路。我们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呼吁民主、统一、和平、进步，在这目标未达到的一天，我们将继续嚷下去。设若我们倒下去，我们相信中国之大，必还有人呐喊下去。这点信心我们是坚持的。

我们不但否认中国已进入政党政治的阶段，甚而对西人骂我们尚不够“现代国家”条件也有同感。谭嗣同在《仁学》里便愤然骂“二千年来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盗也。二千年之学，荀学也，皆乡愿也。惟大盗利用乡愿，惟乡愿工媚大盗”。所谓秦政便是希特勒氏的政治，也即是凭武力弹压而不凭公众同意来维系的政治。罗素于1917年在《人何以好战？》一书里便为文明国家下了个定义：“在文明国家里，除了刑法规定的以外，对其人民不另施用武力。”政治学家奥本汉（Franz Oppenheim）又为野蛮国家下了一定义：“所谓封建或强盗政府，是战胜集团事后设立的机构，其单纯目的为管理辖地，以防域内外之攻击。其国内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间必截然分开”。我们再加上一条定义：文明国家便是其国内必容许反对分子或集团存在的国家。有人驳我们说，与其各别投票，何如由人民这个“标主”指定工程师呢。殊不知中国数千年来在朝

当局向以“人民特约工程师”自居的。究竟谁是人民？在施行强迫教育，有自由传统，选举制度健全的国家，人民尚且不免为人冒名顶替，谎言文盲遍地，专制余毒依然存在，民主尚未出襁褓时期的中国呢？在这情形下，任何一集团被封为人民永久工程师，独占了中国，很自然的该集团必拍了胸脯扬言“我即人民”。有了反对党派，则有关集团于“我即人民”以外，势必还得补充一下“我究竟是谁，我以什么政纲来号召”。它永远得是个有条件的工程师，有限期的工程师。要做到这点，就非经过认真投票手续不可。在腐败然而有限期的政府与健全而无限期的政府之间，我们是要选前者的。

中国的问题早已超出争执名词讨论制度的阶段了。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亲孟反荀的，不但在性善上我们接受孟轲的看法，我们并且相信制度与人心，宪法与实践应同时并重。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”。这是说，中国同时需要“现代制度”与“现代人”。历届的宪法不完全失败在宪法本身，也失败在实践上。两年来的商谈，不全败在原则，也失败在实践上。1774年的沃金尼亚权利宣言，两年后的美国独立宣言，又十三年后的法国人权宣言，如果没有以后尊重人权的政治家以行动来诠释，那些宣言一样可以等于废纸。我们同意一位读者的来书，他说希特勒之为希魔，不怪他本人，而应怪彼时彼境的德国人

民。正因此，我们才不怕迂腐，大声疾呼改造工作。正因此，我们才相信别人尽管在战场上，在竞选台上争胜负，我们这种思想工作者看来是不切实际，尤其令双方讨厌，然其影响却是不可计的。自由主义是空想吗？在未成事实前，什么不是空想？如果把透视镜放远些便是空想，中国需要空想，我们也甘愿担当空想家这个罪名。

政治集团今天的争执，似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盖起怎样一所房子，同时，也就争执到谁来盖，谁经营的问题。极明显的是最好双方合盖，不但建筑工作不必拖延，露宿中的人民也可以尽早安居，而且可以兼容两大工程师的长处。无奈工程师的关切不尽在露宿中的人民，争执的焦点始终是谁做主任工程师，谁当助手。自由主义者本身不愿露宿，也不忍见流民露宿，所以谁做主任工程师，只要房子能盖起来，他们能卖力气处，都义不容辞。事实上双方都带有自己的木瓦匠，双方都不需要他人参加。自由主义者不招兵买马，也即是没有自己的木瓦匠，在现状下，他不能也不屑为坐收渔人之利的第三位工程师。但他们却甚关切露宿的流民，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流民之一员。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在甲乙工程师中有所抉择，他是在嚷，不论谁盖也好，你们别忘记留出透空气引阳光的窗户（民权），可也别忘记盖个容量充足的饭厅（民主），因为饮食空气阳光是健康的基础。这么一嚷，竞争者一定认为有所

偏向；其实在建筑开始前，窗户饭厅都还不存在。有些露宿流民也一定看我们为迂腐，认为问题纯然是谁盖而已。殊不知无论谁盖，这原则还是基本而又基本的。既然双方争夺工程师地位，自由主义或在内地清苦教书，或在拉锯战地带从事朝不保夕的生产工作，都在埋首做着局部的填土打地基的工作。这工作当然没有参加争夺战的木瓦匠激昂爽快，也很有些填土者或不甘淡泊或因遭际而受了刺激，参加了任何一方的木瓦匠行列，但我们也愿慰问各地无声无息的填土者，你们的贡献绝不比斗争更浪费！你们有人记挂，有人尊敬！因为中国如欲现代化，填土打地基的工作的需要是千真万确的。

最后谨再声明一点：大公报是一个报人论政的机构，大公报同人向来是论政而不从政。大公报同人信守司马迁“戴盆何能望天”的作风，既许身言论，就不旁骛，尤其相戒不兼任公职，也不做实际的政治活动。因为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，它的地位是独立的，却不是一般所谓的“中立”。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，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，我们无大野心，却有极大热情，愿为国家建设做些填土的工作。

（原载上海《大公报》1948年2月7日）

拟 J·玛萨里克遗书

永别了，亲爱的手足：当你们看到这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去了。到哪里去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去了的，从来也没有过回报。我可以说的，便是明晨萨宁宫的石阶上，血肉狼藉的那条尸首并不是我。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我留在你们的记忆里。那记忆，我相信愈冲淡，就将愈清晰。因此，明天不用浪费你们的泪水和鲜花，正如今日你们不必浪费有失自己身份的言词一样。时间会裁判我的，我逃不掉。

向来法官对自杀者的结论是“精神失常”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有生以来，我没有比今日更清醒。刚才我还在汽车里和司机搭讪。晚饭我没喝一滴酒，我并且还在钢琴上奏了葛瑞克一段夜曲。就算我的葬曲吧！你们尤其不可相信鲁斯先生的话，怀疑是共产党把我从窗口推下去的。他们能蠢到那个地步，自己拆联合政府的台，供给各地黠武

政客以口实？你们也可以由我尸身上找指痕呀！不。今夜，房里只有嘀嗒嘀嗒的桌钟，但它是机械的，不足以影响我；窗外是一牙新月，照耀在布拉格的屋顶上，灰而忧郁；但对月亮出神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，我知道它辽远，我也知道它圆缺是循环的，它影响不了我。我甚而清醒到能够预料到一小时后我必然会尝到的痛苦，很短暂，但那依然是痛苦的。（我已抚起脑袋了，这为母亲洗漱过，为情人吻过，如今已微秃了的脑袋，等下便砰然与硬石相碰，即刻脑浆便溅射到路墙上。）我既不够怯弱，也不够勇敢来自杀，然而我居然这么做了。我为什么？

一个人不适于离开本土过久，随着贝总统流亡在伦敦的那些年，我虽然自信代表的是捷克人民的利益，与那七八年的捷克，我终于还是脱了节。我不知道那期间的仇恨是怎样滋长的，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田地。那时，做着民主国家永远联盟下去的好梦的，何止我自己？多少贤达不曾往还欧洲首都奔走吗？：谁不珍惜人民的血？谁不认为苦战了十年的世界需要一点休息？谁愿意把世界分为两个，让佛朗哥之流还尸复活？司徒森、戴威思和斯大林不是始终表示世界可以兼容并蓄吗？而从美国施行新政以后，人类生活的社会主义化是已成为定局的了，资本主义早就挂了白旗。及至我由旧金山开会回来，便逢到英国保守党的空前惨败，我为欧洲的进步、光明是抱了怎样的热

望啊！和多少人一样，我是痴想着欧洲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。

终归有人会写出一部希可斯基元帅坠机殒命以后的欧洲——或者说世界外交史，然而在第三次大战以前，这本历史不见得能出现。敢写不敢写还是另一回事，多少档案根本摸不到。等能写的时候，世界上还有什么存在，那就知道了。然而我认为欧洲的分裂，也即是盟国的破脸，是由那时候开始的。当时伦敦波兰的死硬派如果把公道看得比西方支持更重，至少一个祸根可以除去了。为了中欧命运，当时我曾坦白写过一文，还惹起波兰大使的抗议。这篇文章是不难找出的，请你们参照那个去研究一下。当伦敦与鲁布林同时有了两个政府时，欧洲的和谐早已不存在了。等到原子弹及跟在后面的原子外交出现，两极化的大势便已完成。两年前的盟友，今日是敌人了；两年前神圣的“是”，今日是不可恕的“非”了。英国的贝文不必死，因为他从始便看清了这个厄运，而且已“适应”了。铁托及摩尔那也不必死，因为他们始终稳站在河的一岸。我却是个梦想者。我父亲多玛士的梦想完成了，因为那时世界是错综复杂的，而不是单纯两极化的。你们放心，有千贯家财万军人马的“第三”方面失败了的，天底下怎样白痴也不会梦想担当那蠢务。我不够聪明，但还知自量。和平需要桥梁，厮杀当儿是用不到那个的。今日是不许想，不

许犹豫，是脱下外衣投入战团的时候了——无论投入哪边，生活都比我的有意义。我的死，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，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，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！

我既然委托时间来仲裁，就不必再饶舌了。我流亡前后，及在伦敦期间的演讲信札是已印行了的，我为公事投票的记录你们是有的。根据那些，裁判我。没有署着我名字的，我不能负责。我信任你们那份公平。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。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。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，恐怖性的谣言攻势，即便成功了，还是得不偿失的，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，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。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，为了对自己忠实，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，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。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？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？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？今日在做“左翼人”或“右翼人”之外，有些“做人”的原则，从长远说，还值得保持。

桌钟嘀嗒嘀嗒着，时间已晏了。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，但广场的钟，沉痛地响了。夜空浮动远地的舞乐，让青年们能享受时先享受吧！小时候，我挟了书包不知走过那座钟多少趟。它看见过奥匈殖民地的捷克，它看见过慕尼黑前后的捷克，经过八年的沦陷，它也看见了新的捷

克，也看见了一个捷克人的死。然而它始终是丁当当当，
当当叮叮地敲着。愿祖国捷克和时间一样永恒。祝福捷克
人民。

J. 玛萨里克

（原载《观察》第4卷第7期1948年4月16日）

联合国：美国的牺牲品

战争的情绪永远鼓励着一种危险的倾向，便是问题的简单化。纳粹和日本黠武者垮台之前，对未来世界谁不曾怀着灿烂的幻想，直以为战鼓一息，和平的甜果便将捧到我们眼前。回想起来，那幻想并非渺无根据。罗斯福、丘吉尔开罗会晤之后，不是向世界宣誓，绝不要帝国的土地吗？（然而太平洋一千五百个岛屿便如鲫鱼般吞入美国大腹里去了！）不是说绝对尊重信仰自由吗？（连好莱坞翩翩小生罗伯特·泰勒也被传到华盛顿去受审讯了。）大家那时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其实，在作为战后世界和平序幕的旧金山会议席上，不祥的迹象便已充分显露出来了。

“两千年前，当世界文明在罗马帝国的法律与军队支持下萌发时，一个人最可自豪的话是：我是罗马公民。一世纪前，当世界为大英帝国所控制时，英国人由地球四方嚷着：我是英国子民。如今，在 20 世纪中叶，历史以最